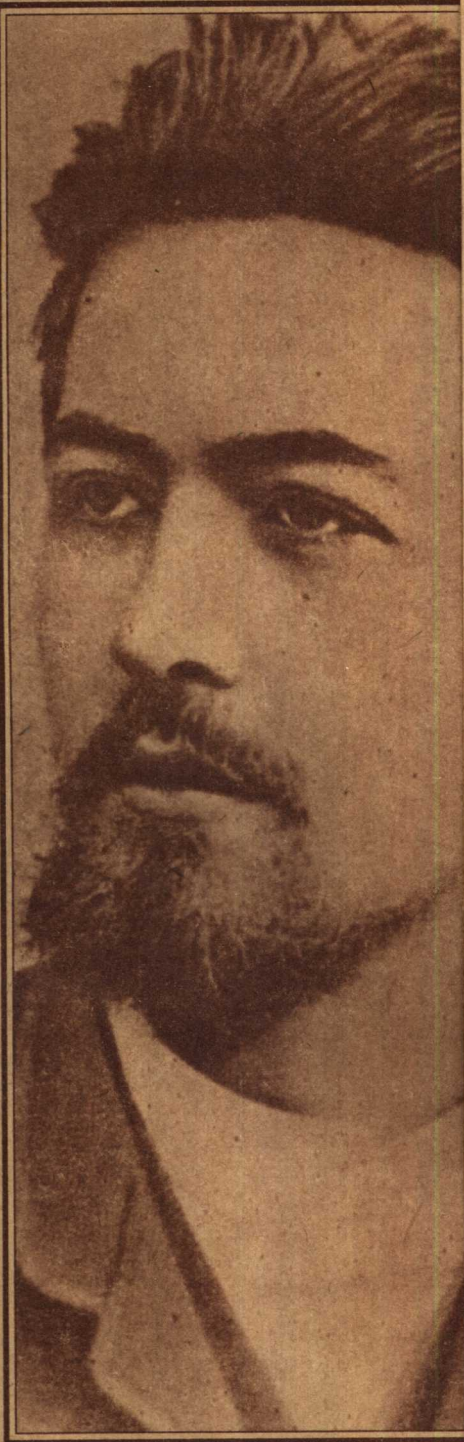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契诃夫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李辉凡 编选

契诃夫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7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契诃夫精选集

李辉凡 编选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3.625 印张 6 插页 547 千字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5329—1382—1

I·1217 定价 29.60 元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本社隆重推出“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卷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目标，分批出版。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编选者序

常读常新的契诃夫

李辉凡

契诃夫的精美的短篇小说及其优秀的戏剧作品瞩目于世界文坛已有一个世纪了，而一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喜欢他的作品，仍然阅读他的作品，仍然研究他的作品，这是因为真正的好作品、优秀的世界名著是百读不厌、常读常新的。俄国著名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得好：“契诃夫的这一章还没有结束，人们还没有像应有的那样读完它，还没有深刻领会它的底蕴，而过早地把书合上了。希望人们重新打开它，钻研它，读完它。”^①

契诃夫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一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大师。他首先以写短篇小说著称，也正是以其精彩绝伦而又朴实无华的短篇小说跻身于世界经典作家之列。他一生写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和一系列的优秀剧本。契诃夫作品的伟大意义在于，他无情地嘲弄和鞭挞了现实生活中一切庸俗的东西、丑恶的东西和奴性的东西，唤醒人们同它们进行斗争，并坚信美好的生活必将到来。与此同时，他对人生丑恶的种种形态的披露又是用一种诗人的崇高的语言、用幽默家温和的

^①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1卷第327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

微笑表现出来的。这也许就是契诃夫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其美学魅力之所在。

1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出生在罗斯托夫省塔干罗格市一个三等商人的家庭。他的祖父是农奴。1841年契诃夫的祖父以三千五百卢布的代价赎得了他自己和全家的自由。后来契诃夫的父亲开了一间杂货店。年幼的契诃夫除了上学外,也帮助父亲看小店和算账。父亲笃信宗教,并要求自己的孩子们也认真做礼拜。但是,小契诃夫对宗教并不感兴趣,他最高兴的事是到当地的剧院看戏。这是他对文艺爱好的最初的萌芽。由于父亲不善于经营,1867年杂货店倒闭了,全家迁居莫斯科。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契诃夫只好一面读书,一面打工(当家庭教师)。1879年中学毕业,同年他考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0年用安托沙·契洪特的笔名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作品。1884年契诃夫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梅尔波梅尼的故事》问世。大学毕业后又于1886年和1887年出版了两本小说集《五颜六色的故事》和《黄昏》,从而奠定了作家在文学界的声誉。

契诃夫的早期作品数量很多,良莠不均。青年契诃夫由于生活和上学的经济困难,为了多发表作品,有时不得不迎合当时报刊的口味,写过不少逗人发笑、无伤大雅的“急就篇”,如《在剃头店里》等(大多署名契洪特)。契诃夫后来反省过这一时期的创作,在出版文集时删去了很多不成熟的作品。但与此同时,他也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和优秀的小说,如《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胜利者的胜利》、《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军士》和《在钉子上》等。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深邃,文笔幽默而凝重。

《一个文官的死》写某庶务官在看戏时打了一个喷嚏，把唾沫星子溅到了前排一位文职军官的秃顶和脖子上，庶务官从而神魂不安。虽然他三番五次地对将军赔礼道歉，仍旧是惶惶然不可终日。结果不过几天便一命呜呼了。故事表明，在专制主义的不平等的社会里，大人物的淫威，灵魂被扭曲了的小人物的奴性心理达到了何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变色龙》中的小警官奥丘梅洛夫则是一个阿谀权贵、看风使舵的奴才。广场上发生了一起狗咬伤人的案件。开始时警官以为咬人的狗是一条普通人家的狗，便扬言要把狗打死，还要给狗主人一点颜色看。但当听说这是日加洛夫将军的狗时，警官被吓出一身冷汗，顿时改变腔调，替狗辩护起来。这时将军家的厨师出来说，这狗不是将军的。话音未落，警官的态度又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其实厨师的话并没有说完，他接着说，这是将军哥哥的狗。结果警官又换了一副脸孔。作者通过警官的三次变脸，活脱脱地勾勒出了沙皇鹰犬的丑恶嘴脸，并且给这种“变色龙”式的典型形象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容。《普里希别耶夫军士》的同名主人公也是一位奴性十足的专制主义的卫道士，他虽然已经退伍了，却仍旧自愿地为专制制度卖力，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不许人们唱歌，不许人们笑，不许人们点灯……这位军士的奴性已经渗入骨髓，深深地体现了沙皇专制警察统治的反动实质。

又如《胖子与瘦子》，写两位老同学不期而遇，见面时称兄道弟，问寒问暖，亲密无间。后来知道瘦子已做了八品文官，胖子只是三等文官时，两人关系骤然巨变，立即从嘘寒问暖变成了打恭作揖，小官对大官的那种阿谀谄媚、低三下四的丑相，简直令人作呕！在《胜利者的胜利》中的柯祖林和库里岑等几个小丑的那种奴才对上司、上司对奴才的精彩表演，更是令人啼

笑皆非。

从上述作品我们看到，契诃夫无疑继承了果戈理、谢德林讽刺幽默的创作传统。他通过诙谐、揶揄的笔触针砭了沙皇统治下的种种野蛮和黑暗，抨击了倚仗权势、阿谀奉承，以及俄国国民性中庸俗愚昧的奴性心理。这些作品有的令人愤恨，有的令人发笑。即使是笑，也不是开心的笑，而是使人压抑、催人泪下的苦笑，同时充满作者忧郁的谴责的调子。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凡是有辱人格、有损人的尊严的东西，都在作者的讽刺、贬斥之列，只是契诃夫的讽刺比较含蓄，它不是让你放声大笑，忘乎所以，而是不动声色，含而不露，笑声里带有苦涩的东西，使读者不能不思考，不能不动情。

2

契诃夫 1884 年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地方的医务工作。他一面行医，一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作家的思想和艺术工力也不断得到提高和发展。反映在他的创作上，是从滑稽可笑的题材转向了对日常生活和劳动群众的关注。这一时期发表的优秀短篇如《哀伤》、《苦恼》、《万卡》、《渴睡》等都是反映下层劳动者生活的作品。作者通过细腻入微的观察和深刻的心理分析，描绘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的悲惨境遇，并寄予深切的同情。《哀伤》中的格里高里本来是个优秀的工匠，在正常的社会中他本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但他却贫穷潦倒，醉醺醺地、半睡半醒地过了一辈子。老婆讨饭，生病无钱医治，终于死在上医院的马车上。直到这时他才清醒过来，哀叹自己“四十年如同在云雾里一样过去了”。《苦恼》中的马车夫死了儿子，心里极度悲伤，多次想向人倾诉内心的痛苦，但

是在这冷漠的社会里却无人同情他，因此只好对自己的老马去诉说。《万卡》写一个小学徒的遭遇。九岁的万卡没有父母，由爷爷领他到一家鞋铺当学徒。在那里挨打受骂，吃尽苦头；他举目无亲，无法向人诉说，只好写信给爷爷诉苦和求救：“来吧，亲爱的爷爷，求你看在基督面上带我离开这儿。求你怜悯我这个苦命的孤儿吧……我的日子苦极了，比狗都不如。”一字一泪，读来令人揪心。《渴睡》也是写一个小姑娘当保姆的悲剧故事。十三岁的瓦尔卡在一个老爷家当小保姆。她白天干繁重的杂活，马不停蹄地东跑西颠，晚上照看孩子的摇篮，还挨打受骂。孩子哭闹不停，她得不到一分钟的休息，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了。她为了想睡个觉，竟无意识地犯罪——把小孩掐死了。显然，等待着她的悲剧是可想而知的。

这些故事，在生活中是平常的、真实的，同时又是可怕的。契诃夫善于把这些日常现象如实地描写出来，成为一幕幕动人的又是血淋淋的悲剧，并从中揭示其重大的社会内涵，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劳动者的悲惨处境呐喊。

这一时期，契诃夫还写了一部著名的中篇小说《草原》。《草原》的中心人物也是一个小孩。但它从题材、内容到风格都与上述作品迥然不同。它不是写人的悲剧故事，而是通过九岁小主人公叶戈鲁什卡的一次旅行的观感，抒写了俄罗斯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反映草原人民的生活，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高尔基赞叹说：“这一篇小说是发香的，轻快的，并且有一种纯粹俄罗斯味的沉思和忧郁。”^①契诃夫自己也说：“我写的时候，觉得四周弥漫着夏天和草原的香气。”^②的确，契诃夫所写的草原

① 《高尔基回忆录》第1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 《契诃夫论文学》第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形象是同草原人民的生活、同作者对祖国及其大自然的的美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里写了清晨、日出、白昼和静谧的月夜，写了田野、树林、五谷飘香、鸟儿虫儿，人影绰绰。整个草原是那么有声有色、多姿多彩，既忧闷淡泊，又馥郁芳香，确实有一股“纯粹俄罗斯的味儿”。有人说，《草原》的主题是“被白白浪费的美”；也有人说，它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的对立”。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实际上这部作品的基本主旨和作者的全部激情已明显地体现在作品的下面一段独白中了：在唧唧的虫声中，在可疑的人影上，在古墓里，在蔚蓝的天空中，在月光里，在夜鸟的飞翔中，在你看见而且听见的一切东西里，你开始感到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力量的壮大和求生的热望……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透露着紧张和愁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个世界来说白白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也没有人需要它……

3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是俄国最动荡也是最黑暗的时代，国内形形色色的理论、宣传、说教层出不穷。沙皇统治者曾叫嚷要把整个俄国冻结起来。契诃夫是一位严肃、正直的作家，面对这种丑恶的现实，他开始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和信念，不仅将一事无成，而且是“一种可怕的事”^①。随着作家声誉的日益增长，他的艺术责任感也越来越重了，他明确指出：“文学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装专家，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责任的人，受责任感和良

^① 《契诃夫论文学》第126页。

心的约束。”^①他这个时期写的许多作品都是有意讨论世界观和生活目标问题的，如《没有意思的故事》中的老教授尼古拉·斯杰潘诺维奇，他虽然德高望重，知识渊博，胸前挂满了勋章，但是却缺乏一而贯之的完整的世界观，没有远大的生活目标，回答不了“怎么办？”的问题。他直到晚年才醒悟过来，才发现自己缺乏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可是为时已经晚矣。

九十年代是契诃夫创作的成熟阶段。这个时期的一系列作品如《在流放中》、《第六病室》、《带阁楼的房子》等的最大特点，是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更强烈的批判性。《第六病室》是直接针对当时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托尔斯泰主义的“不抗恶”理论而发的。医院的第六病室是一间精神病室，但是关在这里的并不都是精神病患者，有些不满现实或“不安分”的人也被当作疯子关进这个病室，例如格拉莫夫就是一例。他在大学念过书，知多识广，作风正派，道德纯正，但是他对现实不满，激烈地批评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坏蛋吃得饱、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社会“像野兽一般生活”。格里莫夫由于自己说了许多激越的话，下意识地感到害怕，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捕。后来他终于被关进了第六病室。作品的另一位主人公是医院的医生拉京。他虽然正直、善良，却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信奉一套“不抗恶”的哲学；他没有受过苦，也不知道是非、善恶。当格罗莫夫问他：“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时，他说：“一切都要看机会，谁要是被关在这里，谁就只好待在这里。”他甚至说：“不诉苦，痛苦就会消失。”然而拉京万万没有想到，与格罗莫夫谈话后不久，自己竟也被当作“精神病人”关进了这个病室。这一结局本身就说明了托尔斯泰主义的破产。第六病

^① 《契诃夫论文学》第35页。

室是一间黑暗地狱，到处是污秽、恶臭，管理人员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殴打、虐待病人，一片乌烟瘴气，阴森可怖。作者把它比作监狱。它何止是监狱，简直就是整个黑暗俄罗斯的缩影。

《带阁楼的房子》则主要是批判“小事论”这一错误理论的。这种理论宣扬的是小修小补的自由主义的“改良”，给人小恩小惠一点安慰，而拒绝对社会的根本改造。作品中的莉达就是“小事论”思潮的受害者，她虽然满腔热忱，但关心的都是小事，整天忙于学校啦、图书馆啦、医疗所啦！诚然，就事论事来说，这些都是善举，但是作者看到，在反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这些办法都是不可能根本改造社会。他通过一位画家的口说：“照我看来，医院啦，学校啦，读书啦，药房啦，在现在的条件下只是为奴役服务的。人民已经被一条巨大的锁链拴住，你不去砍断这条锁链，反而添上一些新的环节。”作者在如何建设新生活方面，也许未能提出正确的方案，但是号召“砍断锁链”，砸烂旧世界这第一步的行动却无疑是正确的。

4

“庸俗习气是巨大的祸害”。庸俗、保守、愚昧是契诃夫的大敌，反对庸俗也是他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他一生都在跟庸俗作斗争，他嘲笑它，用一支锋利而冷峻的笔描写它。《套中人》、《醋栗》、《关于爱情》、《跳来跳去的女人》、《文学教师》、《约内奇》等，就是契诃夫揭露庸俗、贬斥保守、愚昧的力作。《套中人》中的中学教员别里科夫是保守派，顽固派的典型，是旧制度的卫护者、新事物的反对者。他性情孤僻，像寄生蟹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自己的硬壳里去。他晴天上街也要带上雨伞，穿上套鞋，而且一定穿上棉大衣；他的雨伞有伞套

子，怀表有表套子，小折刀也有刀套子；他走路时把脸藏在竖起的领子里，戴上黑眼镜，耳朵用棉花堵上……总之，他总想用一层硬壳把自己包起来，以便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他怕现实生活的刺激，老是称赞过去，甚至把思想也极力地藏在套子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这种描写不是夸张，在现实生活中是完全真实的，而且不是个别现象，正如作品中的布尔金所说：“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另外还有多少这种套中人活着，将来也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呢！”契诃夫塑造的这个典型具有极大的社会性和广泛性，是一切保守、落后的顽固分子的一面镜子。

《醋栗》中的尼古拉也是一个胸无大志、只贪图个人幸福的庸人。他一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庄园，庄园里栽上一些醋栗树。他常幻想着有一天：“在凉台上一坐，喝一喝茶，自己的鸭子在池塘里泅水，各处一片清香，而且……而且醋栗成熟了。”后来他的“理想”实现了，他终于成了一个俗不可耐的庄园主，心满意足地吃上了那“又硬又酸的醋栗”。作者通过他哥哥伊万的口对这种“幸福”进行了分析批判，指出这不是幸福，而是“麻木不仁”。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幸福，庸俗之徒的幸福。

《约内奇》的主人公亦是一个堕落知识分子的形象。地方自治局的医生约内奇原是一个充满幻想的青年，他来到省城行医后，跌进了省城庸俗、闭塞、空虚的染缸里。这里的人只知道打牌、吃饭，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懂，也不感兴趣。你若对他说：“人必须工作”，“生活缺少劳动不行”，那他们就会生气，会把这些话当作训斥。只要话题不是吃玩，比方谈到政治或科学问题，他们就一定茫然不知所措，或者讲出一套愚蠢的大道理来。久而久之，这种空虚、无聊的生活把约内奇仅有的一点热情和

思想也消蚀了。现在他也成了一个除了吃饭打牌外，就只会清点钞票的俗物了。

除上述各种庸人俗物外，契诃夫也塑造了一些美好、纯正、憧憬未来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形象，如《醋栗》中的伊万·伊万内奇、《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德莫夫医生等。“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就是伊万·伊万内奇告诫人们的一个警句。还有一些是不同程度上开始觉醒的人的形象，如《文学教师》中的尼基京、《带狗的女人》中的古罗夫、《三年》中的柯斯佳和《我的一生》中的主人公等。他们觉醒后才惊讶地感叹道：“我的上帝，我是在什么地方啊！我给庸俗、庸俗，团团围住了。乏味而渺小的人、一缸缸的酸奶油、一坛坛的牛奶、蟑螂、蠢女人……再也没有比庸俗更可怕、更使人屈辱、更使人愁闷的东西了。我得从这儿逃掉，我今天就得逃，要不然我就要发疯了！”

5

契诃夫从萨哈林旅行回来后，便全家迁到莫斯科近郊的梅里霍沃村居住。由于他扩大了接触面，密切关注社会各阶层生活，创作视野也进一步开阔了。除知识分子主题外，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农民和妇女等许多具有迫切而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从而写出了《农民》、《宝贝儿》、《在峡谷里》和《新娘》等后期的许多重要作品。

《农民》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俄国农民悲惨的生活景况。在沙俄，自从宣布取消农奴制以后，农民的处境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贫困化了，因为农民进一步受到了地主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农民》写的虽然是一家农户的状况，反映的却是俄国千百万农民的共同命运。《在峡谷里》则主

要表现了俄国农村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过程，同时揭露了农村新兴资产阶级的残酷性。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阿克西尼娅。她本是一个普通妇女，但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却可以吞噬人的灵魂，她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贪婪、残忍的杀人犯。为了夺得家产，她竟残暴地用开水把小侄儿活活地烫死，并把年迈的公公撵出家门，使他沦为乞丐。作品还安排了与之对立的另一个形象丽巴，她善良、勤劳、老实，在这场残酷的争夺中，她是一个牺牲者。不过，丽巴这个形象在作品中未免过于软弱、无能了，连一点点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这使人联想到《宝贝儿》中的女主人公奥莲卡。她也是一个唯唯诺诺，完全没有主见、只满足于小市民幸福的女性，是一个“驯服的奴隶”。所不同的是，契诃夫对奥莲卡采取的却已经是批评、揶揄的态度了。

在另一个短篇小说《新娘》中，作者一反过去忧郁、深沉的调子，发出了一种坚定而又响亮的声音。《新娘》中的女主人公娜佳完全是一个新人的形象，她毅然地告别了猥琐、庸俗的过去，勇敢地走向新的生活，并且义无反顾，坚信美好的明天必将到来。“在她的面前现出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唤她。”《新娘》是契诃夫晚年（1903年）写的最后一个重要短篇小说，这时他的情绪空前高涨，作品的风格也变得分外清新、明朗，充满激情。这无疑与二十世纪初俄国高涨的革命氛围是分不开的。可惜这个时期的创作还没有完全展开，契诃夫便于1904年7月2日与世长辞了！这不能不令人惋惜。

契诃夫是杰出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大师，所著多为短小、精悍的精品，然而作品的题材极为广阔，思想内容精深博大，就是说，他通过细小的、微不足道的、最普遍最平常的生活素材，

揭示出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内蕴及其本质。从审美意义上说,是从微观的具现,即从一人一事,甚至一个生活碎片,不夸张,不修饰,按生活本来的面目加以描写,达到了宏观的总体把握,即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复杂多彩的现实生活。这就是契诃夫创作的最基本的艺术手法。

从艺术风格上看,契诃夫的早期创作多为讽刺性作品,如《胜利者的胜利》、《一个文官的死》、《变色龙》等,诙谐幽默,都是喜剧或悲喜剧。中期作品的基调转为冷峻、忧伤,特别如《哀伤》、《苦恼》、《万卡》、《渴睡》等描写小人物的小说,往往都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哀愁。接着是一批揭露小市民知识分子庸俗生活的作品,如《套中人》、《醋栗》等。晚期创作则开始走向明朗,富于时代气息,如《新娘》等,只是时间不长,刚刚出现就熄灭了。

契诃夫创作的最大特点是文体的简朴和语言的洗练。他把质朴、简练看作是衡量作品的最高标准,也是他追求的最高目标。他说过,“学会写得有才气,也就是写得简练”;“简练是才能的姊妹”^①。他的作品,篇幅都不大,有的作品只几百字。他没有写长篇小说,曾经试写过,但没有成功。据他自己说,主要是害怕“冗长”,而“对一切短的东西却有一种狂热”^②。

情节淡化也是契诃夫简朴的特点之一。他的作品都不以故事情节取胜。它既没有引人入胜的性格冲突,也没有故意安排的悬念,更没有插科打诨的噱头。它只写日常生活,笔调舒缓、平和,从容不迫,甚至使你感到有点漫不经心,但掩卷之余,你的心却不能不为之而颤动。

① 《契诃夫论文学》第152、154页。

② 同上第144页。

文字洗练是达到作品简朴的主要手段。不论是节约篇幅还是淡化情节都离不开文字的功夫。契诃夫的语言文字是极其简洁、紧凑的，他要求做到字斟句酌，不允许有一个多余的字；他要求“无情地删削”，“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①，真正达到言简意赅。托尔斯泰认为，在这方面，契诃夫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高尔基则把他同普希金、屠格涅夫等艺术大师相提并论：“作为文体家看，契诃夫是不可企及的，将来的文学史家在谈到俄国语文的成长的时候会说：‘这种语文是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创造的。’”^②

6

剧本是契诃夫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戏剧创作的最初的尝试，是写一些短剧——独幕喜剧、戏剧小品等。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写多幕剧、正剧和讽刺喜剧。1887年契诃夫创作了第一部正剧《伊凡诺夫》，随后是几部讽刺喜剧如《蠢货》（1888）、《求婚》（1889）、《纪念日》（1891）等。这些剧本故事诙谐，情节轻松，把抒情、幽默、叙事、悲剧、喜剧因素都揉合在一起。从这里可以看到契诃夫戏剧艺术革新的端倪。

契诃夫戏剧革新的最重要的标志是《海鸥》（1896）。《海鸥》的成功，第一次把契诃夫与莫斯科剧院的名字联系了起来，第一次把他与俄国戏剧革新运动联系起来。继《海鸥》之后，契诃夫又连续写出了《凡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0）和《樱桃园》（1903）等几部堪称经典的戏剧佳作。从此戏剧家契

① 《契诃夫论文学》第144页、243页。

② 高尔基《论文学·续集》第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